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形成的理论渊源和实践基础

双传学

内容提要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具有极为丰富的理论来源,源自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源自借鉴和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践基础,不仅包括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积累,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来的砥砺奋进,而且包括对人类现代化实践探索经验的科学总结。

关键词 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现代化道路

双传学,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210093

每个时代的思想理论都是特定时空的产物,都是特定时代的人物从事一定社会历史活动的结果。因此,深入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和实践基础,既可以反映这一新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特征,也可以进一步彰显出它的重要历史贡献,更有助于我们认清其行动指南和方向引领作用。正所谓“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学得彻底才会用得纯熟。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渊源

思想理论的生成需要思想源泉和文化土壤。只有继承前人思想和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科学的理论才有可能生成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自然也不例外。

第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源自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的源泉。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他们的著述中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43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在人类思想史上,就科学性、真理性、影响力、传播面而言,没有一种思想理论能达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也没有一种学说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世界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真理威力和强大生命力,表明马克思主义对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推动社会进步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

用。”^[1]可以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首先源自马克思主义理论谱系,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践结合的最新产物。这一清晰的定位和认识,既是对我们党一以贯之坚持的科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的弘扬,也是新时代历史背景下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和基础。从总体上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含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精髓,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路线与人民立场,恪守了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追求,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

自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以来,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发展,深刻改变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从历史发展来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也曾经受到质疑。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社会主义大国苏联的解体以及后来的东欧剧变,令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经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曲折。此后对社会主义的质疑声不断,有人甚至宣称中国即将步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后尘。但是历史并未如福山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学家所预言的那样去发展,中国不但在世界上牢牢举稳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旗帜,而且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了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有机统一的科学理论体系,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影响力大大增强。可以说,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科学社会主义的坚持和发展,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思考和经验总结,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生成和发展的整个过程。

第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继承与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坚持与发展,而且是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系列成果的坚持与发展,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新成果。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之所以显示出强大生命力,最根本的就是我们党始终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时期的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先后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理论创新成果。从思想延续角度看,这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体内容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奠定了思想基础。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主要体现在习近平关于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论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思想、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思想、党的建设思想等方面。譬如,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的科学判断、对人民主体地位的强调、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表述以及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开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实践等,都体现了对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继承和创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主要体现在对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等的继承发展。对社会主义本质的首次明确界定是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做出的。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依据社会主义本质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还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3]。党的十九大报告在部署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时重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4]。这些表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65页。

[2]《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92页。

[4]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产党人思想的坚持与发展。

第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营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是我们引以自豪的精神财富,是维系中华民族历史的根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生根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实践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其形成与发展的养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家治理思想、传统修身之道、传统自然之道、中和文化等都体现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在国家治理方略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汲取了中国传统的国家治理中可资借鉴的因素阐释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思路。比如,他引用北宋王安石著《周公》中的“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说明善法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性;引用《国语》中的“令之不行,政之立”,说明要维护党中央权威,国家制定的方针政策要贯彻执行;引用《管子·牧民》中的“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强调一个政党的前途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这些对传统治国之道当代意义的阐释,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中和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和谐是中华传统文化追求的境界,中和文化流淌在中华民族的血液里,形成了爱好和平的好传统。习近平总书记吸纳中和文化的优秀传统,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重大创新思想,强调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主张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包容、交流、互鉴的新时代理念,不搞赢者通吃,反对你死我活的丛林法则,充分体现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智慧大格局。

第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吸收借鉴了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博大的情怀和科学理性的方法对待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进步文化。他明确指出,“对丰富多彩的世界,我们应该秉持兼容并蓄的态度,虚心学习他人的好东西,在独立自主的立场上把他人的好东西加以消化吸收,化成我们自己的好东西”^[1]。比如,从古希腊至今,公平正义始终是西方进步文化关注的重点,很多思想家对此进行了积极的探索。约翰·罗尔斯是当代美国的政治哲学家和伦理学家,是西方公平正义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正义论》系统地阐述了公平正义思想,把正义归纳为法律与社会正义、抽象与具体正义、实体与程序正义。他的分配蛋糕理论生动地阐述了程序正义的重要性与合理性。习近平总书记在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中,自觉地把公平正义摆在突出的位置,“公平正义是世界各国人民在国际关系领域追求的崇高目标”^[2]。他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强调不让一个人在小康路上掉队;他提出全面依法治国,强调要公正司法。这说明公平正义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西方进步文化的契合点。

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国内实践背景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理论,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条件 and 实践背景包括: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与历史性变革、新时代国内环境发生的深刻变化带来的风险因素及习近平同志从地方到中央的实践探索等。

第一,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实践与成就,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深厚的实践支撑。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在复杂困难的国内外形势下,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医治了战争创伤,创造性地进行了一场“非暴力”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使生产力得到解放和发展。与此同时,一个崭新的课题出现了:如何在没有现成模式可循的情况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286页。

[2]习近平:《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建设合作共赢美好世界——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0页。

下建设社会主义?在学习思考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过程中,我们党意识到苏联模式的局限性,并适时提出要以苏为鉴,必须走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道路。循此思路,我们党领导人民开展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为人民生活富裕、中华民族振兴奠定了坚实基础,积累了一些宝贵的经验。但由于在一段时间里,受到主客观条件的影响,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出现了“左”的错误,行动上偏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导致社会主义建设的很多正确思想没有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为改革开放以后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的依据与参考。改革开放以后,在正确思想理论的指引下,我们党认识到时代主题从“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实现了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相对封闭”转变为“对外开放”。正确的思想引领正确的实践。在改革开放的发展过程中,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展现了强大的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中华民族实现了由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党和国家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可以说,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实践和成就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深厚的实践支撑,使其成为经过历史检验和不断被证明的科学思想。

第二,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与历史性变革,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直接的实践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发展面临诸多新情况、新问题与新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政治勇气和强烈责任担当,领导人民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行了全方位的社会变革,改革囊括了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整个社会运动系统,具体落实到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个方面,实现了社会总体的历史性发展。通过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有效改变了忽视、削弱和淡化党的领导的情况;通过贯彻新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有效改变了发展方式粗放和发展观念不正确的情况;通过各方面体制机制改革,有效改变了发展活力和社会活力不足的情况;通过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效改变了法治建设相对落后及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司法不公的情况;通过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有效改变了社会思想舆论环境中的混乱情况,增强了党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导权和话语权;通过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有效改变了生态环境恶化、破坏生态环境、忽视生态文明建设的状况;通过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有效改变了人民军队中存在的不良政治生态,使其实现了革命性的重塑;通过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有效改变了我国在国际力量对比中的不利状况,国际影响力再度提升;通过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有效改变了过去管党治党存在的宽松软的情况,党内政治生态明显好转。可以看出,这些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直接的实践基础。

第三,新时代国内环境变化带来的风险和考验,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现实的实践依据。由于时代的特殊性,特定的时代都有相应的风险和考验。就革命战争年代而言,最大的风险和考验是如何抵御强大的敌人,保存自己的实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风险和考验主要来自“发展起来以后”的难题和挑战,既遇到世界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普遍性问题,也遇到国内发展过程中由于历史的或现实的原因而产生的问题。例如,从经济发展来看,我国正处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时期,粗放的发展方式难以为继,并且随着人口红利减退,劳动力成本上升,再加上资源环境约束加大,经济循环不畅、发展质量不高等问题十分突出。这些风险和考验也正是我们党提出经济新常态、推进供给侧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等的现实依据。再如,在意识形态领域,虽然我们总体上保持向上向好的态势,但是面临的风险仍然十分巨大。一些错误思潮特别是民粹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等通过否定和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竭力与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争夺

话语权。市场经济的消极负面影响反映到人民的精神生活和党内政治生活中来,导致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受到挑战,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消费主义滋长蔓延。也正是这些风险和挑战使我们党强调要巩固意识形态阵地、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等。

第四,习近平同志从地方到中央的实践探索,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素材。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现实针对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追根溯源,这与他在地方和基层的丰富实践、深邃思考和不断探索密切相关,体现出一以贯之、深化拓展、不断升华的发展脉络和思想逻辑。习近平总书记历经基层、地方和中央等层面的主要领导岗位,既有在落后偏远地区又有在发达地区的从政经历,其从政经历伴随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孕育和发展过程。如果把十八大后出版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和习近平在福建和浙江工作期间分别撰写的《摆脱贫困》《之江新语》对照来看,可以窥见,无论是思想内涵方面,还是精神品质、语言风格方面,都具有内在的继承性和一致性。也正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基层和地方丰富的实践沉淀,成就了他精深的思想理论和非凡的领袖魅力。

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现代化建设实践背景

由传统走向现代,设计符合时代特征与本国实际情况的现代化方案,并建构符合自身实际的美好制度与理想生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理想,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孜孜以求的整体性目标。但是,各个国家在探索自己的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征程中,究竟是在一种所谓的普适性模式指导下展开,还是在紧扣本国实践特殊性基础上做出多样性的选择,这是需要集中思考并加以系统回答的一个基始性问题。这一问题,对于后发民族国家而言更加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用提纲挈领的方式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1]。通过总结人类走向现代化道路过程中的相关经验与教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实现民族自强复兴与推进世界现代化图景中的中国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难能可贵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

第一,西方资本主义所主张的“一元现代化”模式不过是一种西式话语霸权,在理论与现实层面上面临着双重困境。众所周知,近代以来人类的现代化探索,确实首先是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开启的。不可否认的是,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现代化模式确实有一定的合理之处,诸如对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对先进科学技术与管理经验的使用等。在全球化尤其是殖民化力量的推动下,西方现代化的模式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统治性地位;广大非西方国家在西式现代化话语霸权的压力下,被迫沦为西式现代化道路的附庸。然而,西方国家是否可以垄断人类关于现代化的解释权与话语权?答案很明显是否定的。一方面,西方国家自身在推动现代化的过程中,已经面临诸多在资本主义统治秩序内难以解决的问题与挑战。例如,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长期未能从危机中复苏,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等方面的问题层出不穷。另一方面,一些后发国家因为照搬照抄西方现代化模式,正面临着严重的危机与风险。正如有的国外学者所言:“对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来说,全球化并没有带来它承诺的经济利益。贫富差距的持续扩大已使得第三世界中越来越多的人处于赤贫之中。”^[2]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2][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全球化及其不满》,〔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年版,第20页。

第二,中国共产党人以社会主义为框架,实现了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的模式革命。近代以来,伴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现代性的强势输入与冲击,中国在西方坚船利炮等武力压迫下以被动姿态卷入这股现代化浪潮之中。中国仁人志士在亡国灭种的现实危机面前,展开了学习西方现代化的艰辛探索。然而,因为缺乏契合中国具体实际的科学理论的科学指导,诸多学习西方的实践运动最终都纷纷走向了失败。中国人开始着力思考一个关系到未来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即“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最终成功回答这一问题的是中国共产党人,他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科学分析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国情,并最终确定走社会主义道路,将中国现代化目标的实现置于社会主义道路中加以综合把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为推进中国现代化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通过恢复国民经济建设,中国建立了比较齐全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化体系,有效夯实了推动现代化的物质储备和现实基础。在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就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口号,并且在建设初期取得了来之不易的巨大成就和宝贵经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开创和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在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的基础上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通过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方式推动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通过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现代化事业提供重要载体,等等。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创造了经济连续几十年高速增长的中国奇迹,催生了新的理论创新和社会突破性发展,走过了发达国家用几百年时间走过的现代化进程,这是一条被实践证明了的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色的正确的现代化道路。

第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丰富发展了人类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从人类走向现代化的历史逻辑来看,中国道路背后的一个核心因素就是对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与求索。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继承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现代化探索的丰富宝贵经验的基础上,通过总结西方现代化实践中的深刻教训,已经取得了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阶段性成绩。这一成绩的取得,源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开辟及其不断发展。需要明确指出的是,本文探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丰富人类走向现代化过程的多样可能性问题,并非意味着要向其他民族、国家与地区输出现代化的“中国方案”,也非意味着要求其他民族、国家、地区学习推进现代化的“中国经验”,而仅仅是为了给广大后发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一种借鉴或启示,即任何民族、国家、地区都必须紧密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独立自主地探索出一条符合自身实际的现代化道路。人类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和方案,不可能只有西方现代化模式,而是以多元多样化方式存在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的那样:“我们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1]尽管中国道路拓展了人类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道路仍然处于不断的探索过程之中,我们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面临着不少在发展中需要被不断解决的新问题与新矛盾,发展起来之后的中国“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告诫全党,我们在现代化建设的前进道路上要防范“中等收入陷阱”“塔西佗陷阱”“修昔底德陷阱”等风险,迎接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复杂变化带来的严峻挑战。

[责任编辑:洪 峰]

[1]习近平:《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北京〕《人民日报》2017年12月2日。